

黎明 文稿

周立波

7.2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17.2
53
3

黎明
文稿

BH26116

周立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A 824634

封面设计：陈世五

黎明文稿

周立波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5 字数106千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250册

书号：10118·333 定价：0.52元



出版说明

《黎明文稿》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生前为我社编定的一本集子。收入的作品大都写于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发表过，有的尚未发表。其中有小说、散文、日记体的报告文学等。作品内容深广，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这是周立波同志在毕生从事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上最后留下的宝贵财富。

前 言

以下各篇，大多写作或发表于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黎明时节，
即以《黎明文稿》为书名，编成此
集出版。

周 立 波

1979年春

目 录

《暴风骤雨》重印后记·····	1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3
深入生活，繁荣创作·····	11
谈谈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	23
诗歌片语·····	28
一个伟大文献的诞生·····	31
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	38
朱总司令事迹片断·····	49
长沙大火前后·····	60
《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	66
湘江一夜·····	75
万里征尘·····	103

《暴风骤雨》重印后记

《暴风骤雨》是反映土改运动的一部小说，作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热情的鼓舞，印行了多次。最近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书停止发行了。党中央英明果断地清除“四人帮”以后，被他们肆意破坏和篡改的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得到了恢复，无产阶级的文苑又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这部小说，使它重新和广大读者见面，这使我非常激动。这件事情体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党的文艺事业的亲切关怀，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忠实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又一例证。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我遵循毛主席指出的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方向，跟随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后到了东北，参加了那里的土改运动。在土改的火热斗争中，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阶级斗争教育，积累了素材，创作了《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一次创作实践。这次重印，由于时间急促，来不及多加修改。经过“四人帮”十年浩劫的复杂斗争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和艺术鉴赏能力大大提高了，希望读者对本书多予批评，使我能够听到一些珍贵的意见，作为再次修订的依据。

1977年1月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我想谈谈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接触文学了，我所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难免粗浅，希望同志们不客气地予以指教。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这个方向不容许改变。我们要终生坚持这个方向。但要更好地服务，就必须把文章写得好一些，把小说的艺术性提高一点。

政治和艺术可不可以分开来考虑？毛主席把批评标准分成两个，就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考察创作也要从这两方面着眼，却又不能机械地分开。两者应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分析艺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那就是说，要使用跟“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方法。

有位同志回忆，毛主席谈过美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文艺理论家们的阐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只能说一点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我认为，艺术的美，其源出于生活。但是，生活里的美是要诗人们、作家们去发现，去挖掘的。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的再现，但决不是照抄，更不是单纯的照相。生活里也有平淡的，单调的，枯燥的，甚至庸俗的，不能入诗，不必入诗的东西。还有些东西，在生活里十分重要，也不一定能入诗。比如，数学家陈景润同志的三麻袋数目字和方程式，在他心里，美得不得了，不然，他就不会那样迷着它们了。但是，如果有人把它们照搬到小说里去，肯定是会吃力不讨好的。又比如说，标语口号在生活斗争中十分重要，但要把标语口号式的语句整页地写进诗和小说里，也是不行的，不能够打动人的。毛主席教导说：“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生活里的美，要写出来，首先要能看出和感觉出来。为要这样，就得充分熟悉现实里的人和事。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但是，怎样熟悉人？还是有待探求的问题。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有些作者在生活里，实际上没有生活。”这里的所谓“没有生活”，可能是指的没有找到能够入诗的东西，总觉得这也不能写，那也不好写，或是不值得一写。结果是深入宝山，空手而回。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况。

清末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在这里说的是诗词，也可以移用于小说。《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人，就是因为作者和他所描写的对象长期相处，他把他们的心都看透了，深深理解了他们的一切的缘故。

在我们的社会里，要熟悉人，最好是和他们并肩战斗，共同工作。我在东北参加土改的期间，天天和农民在一起。我那时候在工作队，后来又在区委会。记得每天早晨，我还睡在炕上，农民们就挤满一屋。他们有的是来谈问题的，有的光是来看看的。这样的接近使我最自然，也最方便地了解了他们的性格、心理、行动、习惯和语言。这是我深入生活收获较多的一个时期。

在运动中最能了解人，每个人从他的特定的政治地位出发，都会充分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矛盾也特别尖锐和复杂。这些生动的情况正是小说作者希求的极为珍贵的材料。

当然，熟悉人，也还有别的途径。比如，你要了解一个人，除开同他本人接触以外，还可以通过他的亲戚、朋友们对他的反映；如果是干部，就可以通过他周围的同志，他的上下级的反映来了解他。

我写过个贫农，叫做陈先晋，这是有个固定的模特儿的。这模特儿，我只见过一次，只到他家里去过一回。那一

回，也只是去亲眼看看他和他的家人的外貌以及他们日常所处的环境，他的小茅屋和屋前屋后的山场田土等等。至于他的性格、脾气、历史、家庭和他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态度等等，我早已通过和他相处多年的亲戚的闲谈了解很深了。

我们对人物的了解，在注重客观实际方面，有点象审干工作；但审干只注意政治问题，而文学工作者的了解人物，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古话说：“到处留心皆学问。”我们的熟悉人的工作，正是要这样。

不但要事事留心，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察得细。记得在东北，我留心过，家有两匹马的中农和家有一匹马的中农，谈吐、心理、要求和对土改工作队的态度，都大不一样。这些地方，如果不细心，就滑过去了，导致写出来的中农，显得没有个性，很一般化。

为了熟悉人，对环境的留意，也很重要。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环境的，也可以说，环境是人的活动的舞台。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说的典型环境主要指的是时代背景和社会的政治情况，而在我们创作时，除了这个大的方面应该注意外，还应该细察人物所处具体的生活环境。例如自然的景物，房子的构造，衣帽的样式等等，通通都要细密地加以观察。

把以上一切都摸清楚了，当你进到创作过程时，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关于熟悉人的问题，我就简单地谈这些。

下面谈谈学习文学遗产的问题。

两千多年以来，我国的文学家们创作了好多优秀的作品。西汉的司马迁是一位大历史学家，做过“太史令”，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担任过历史研究所所长。但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把许多历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文艺上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从《史记》到《三国演义》，到《水浒》，到《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等等，两千多年以来的作家们创造了成千成百的人物。这是我们祖国极其宝贵的遗产。可恨“四人帮”妄图割断历史，违背毛主席的“借鉴”的教导，否定一切，使青年人不敢向遗产学习。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从灿烂的古典文学里学习写作的本领。

当然，对于过去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研究，不能盲目地推崇，生硬地摹仿。对于封建时代的东西，我们要剔除它的封建的糟粕，但是他们摸索出来的创作的规律，却是我们要“借鉴”和学习的。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例如叙事诗和小说，便于描述人的行动，长于叙述和描写变化着的人和事，短于静止的刻画。静物写生是造型艺术擅长的作业。因此，小说主要地要写人的行动，要以动写静，要选取人物的一个或几个或几十个关键性的行动，来塑造人物的形象。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叙孙武生平的一段，司马迁只用了四百零五个字，四百字一张的稿纸，只有一张略多一点。大家知道，孙武子著有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参加了吴楚之战，帮助吴王打败了强楚，占领了楚国的郢都。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别出心裁，只挑选了他的一宗规模不大的事件来概括他的生平。他的转战千里的赫赫武功以及千古流传的兵法，作者只用了几句话，加以虚写。他使用四百零五个字的绝大部分去描写孙子初见吴王的一幕。阖庐接见孙武时说：十三篇他都看了；问他能否作个小小的试验？孙子答应说：可以。吴王又问：可不可以叫妇女来试。孙武又回说：可以。在阖庐方面，这是有些开开玩笑的意味的，孙子却认真严肃地把吴王选来的一百八十名美女分为两队，指定吴王的两位宠姬作队长，并反复地申述了命令。他嘱咐她们，叫她们“左”，就看左手，“右”，就看右手，等等。于是，在鼓声中，他庄严地叫“右”，妇女们却大笑起来。孙武子责备自己，又把条令反复地申说。但在第二次叫口令时，妇人们仍然大笑，孙子就要把两个队长抓去杀头。吴王在台上望见，大吃一惊，慌忙派人来传旨停刑，并且跟孙子说了一些求情的好话。孙武却引用他的兵法上的话，反驳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坚决把吴王的两个宠姬杀了。以后，他重新挑选了两个队长，雷厉风行，把兵练好了，请吴王下台来检阅。阖庐伤心地说：“我不检阅了，将军你请回馆舍歇息去吧。”

这是孙子初见吴王的一个关键性的行动，而且是多么惊心动魄呵！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当时，杀了国王的两个宠姬，孙子是马上可能丢掉脑袋的。但这位将军不顾性命的危险，毅然地执行兵法，维护了军纪的森严。在短短的三百多字中，一个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威风凛凛的果断的将军的风貌跃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西厢记》的《闹斋》一折，也是用的这种描绘人的动作来反映静态的美的手法。

用人们的行动和动作，用环境的反映来描绘静态的“美”和生活的“真”，以宣扬当时的“善”，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里充满了这类珍奇的宝石。

对话属于人的行动的一部分。“言者心之声”，对话最能表现人们的心理，也是一个刻画人物的有力的手段。一部《红楼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这里不详述了。

行动写得深刻而生动，又遵循着生活的逻辑，对话符合各色人物的阶级地位和性格特点，故事和情节也就形成了。高尔基指出：“情节是性格的历史。”这句话很对。为要把构成情节的行动包括进去，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故事情节是人物在典型环境里的合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性格特点的言行的连续。

小说，特别是较长的短篇和长篇小说，要使人看得下去，要有魅力，应该在结构上尽量地避开平铺直叙；不要一直紧到底，通篇都是战斗的高潮；应该有紧有松，有起有落。

故事得有曲折，文字贵有波澜。我国古时候，民间传说李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天上没有文曲星，科学已经告诉我们的。地上的李白也是凡人，不过，他早年没有上“四人帮”的当，去搞“打砸抢”，或者是什么书都不读，尽交“白卷”。据我们了解，他是很用功的。从他的诗里，也可以看出，他佩服的诗人不在少数。他游历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成年累月地旅行，在野外，船上，渡口，马背上，酒店里，接触了船夫、津吏、象汪伦这样的农民，以及酒肆的吴姬，庙里的和尚；此外，还有皇帝、后妃、宦官、大小官僚和各种知识分子。李白不是文曲星，而是人间哺育出来的卓越千古的诗人。但是文曲星这词中的“曲”字是很有意思的。文贵曲折，因为人生的道路都是曲折的。我们想一想，有哪一个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道路不是曲折多姿的呢？人生如此，反映人生的小说如果是笔直的，平淡的，那就显得很真实，因此也就失去艺术的魅力了。

《聊斋》反映的生活，离开我们相当遥远了，但是这本书至今还有魅惑力。有人评论蒲松龄的这部小说是“水佩风裳，剪裁入妙”。大家可能看过他写的《红玉》。穷秀才冯相如和红玉的结合，经过多少波澜呵，一浪接一浪，真正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作者深得文贵曲折的妙用。

以上说的，是我个人读书和创作的点滴体会。

1977年